面向教育强国的高校质量文化建设

陈正权，李 恋
（云南师范大学 教育学部，云南 昆明 650500）

摘 要：质量文化对引导高校办学质量的理性回归与价值重构、夯实教育强国建设“六力”的指标征候具有促进作用。其内在的社会视阈、哲学属性、教育立场、实践场域决定了质量文化建设既是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应有之义，也是重塑教育生态的必然要求，更是化解质量危机的关键抓手。然而，质量文化建设面临着多种挑战，如目标混乱、责任规避、制度缺失、评价异化、表征趋同等问题制约其内生引领和内聚共生。教育强国建设背景下的高校质量文化建设，需要构建“使命中心”“合作共治”等模式，推动“组织范式”重构，形成开放联结的质量矩阵，注重“持续改进”塑造良性循环的质量生态，突出“个性特色”衍生内省独特的质量品牌，赋能高等教育龙头作用的发挥，形成推动教育强国建设的倍增效应。

关键词：教育强国建设；高校质量文化；特色高校；教育生态
中图分类号：G640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2-8742(2026)01-0113-09

高等教育要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教育强国建设中发挥好龙头作用、基点支撑，需要在建设过程中体现文化逻辑，在人才培养各方面体现教育教学规律，在办学治校中体现本土特点，讲求质量、追求卓越，积极构建高质量教育教学体系。其中，高质量的关键在于破除教育重点领域、关键环节中影响教育高质量发展的制约因素[1]，在于以文化自觉为基础的质量控制与改进效能的发挥。因此，以质量文化破解质量危机、增强高校办学定力和对自律性的坚守[2]18-24，以深层的信念共同体[3]实现教育高质量发展，尤为重要且亟需。目前，众多学者对质量文化开展了相关研究，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关于概念属性的研究，主要是在对高等教育质量文化路径论、结构论、功能论以及多重定义进行初步辨析的基础上[4]，充分探讨其内涵与特征；二是关于建构逻辑的研究，主要是依据EUA总结的高等教育机构在引入和实施质量文化过程中的战略、领导、参与和反馈[5]等四个方面来细化、具体化质量文化建设的要素和体系；三是关于多重审视的研究，主要是从理论与实践的角度，聚焦质量、质

基金项目：云南省2023年本科教育教学改革研究项目“质量文化引领下的地方高校质量保障与持续改进机制的实践研究”(JG2023279)
作者简介：陈正权，男，教授，教育博士，研究方向为高等教育与院校治理。
李 恋，女，副教授，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高等教育与院校治理。

中国知网 https://www.cnki.net

量保障与质量文化等内在关系，探讨和反思大学在危机意识、质量担当以及质量能力建设方面[2]18-24是否缺失。以上研究为质量文化建设奠定了理论基础，明确了价值取向和行动逻辑。但就高校紧扣新一轮审核评估“自觉、自省、自律、自查、自纠”“五自”的内在要求[6]，将质量文化的价值理性化、制度系统化、运行具体化等一体谋划和构建的研究不够。基于此，本研究尝试结合教育强国建设要求，解析质量文化的内在属性和本质特征，以厘清高校质量文化建设过程中的现实困境，为进一步探索质量文化建设的实践路径，推动质量文化在成型培育、制度保障、执行落实、监督评价、调整改进等全流程中构建有形有感有效的具体机制，积极打造学校可培育、可落地、可提升、可传承的质量文化建设模式提供一点建议。

一、高校质量文化建设的价值意蕴

其一，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应有之义。当前我国高等教育进入普及化阶段，面临着新型的人口结构变化、多样的社会发展需求与多元的民生利益诉求等问题，国家多次以正式文件关注和强调质量问题，以政策的实施推动质量文化建设。2010 年《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 年)》及 2018 年教育部印发《新时代高教 40 条》等文件中多次提及“质量”。此后教育部多次印发文件强调质量文化建设的重要性以及其在大学发展过程中的地位作用。《普通高等学校本科教育教学审核评估实施方案(2021—2025 年)》首次将“质量文化”单列为审核要素，进一步突显质量文化建设的必要性和紧迫性，细化质量文化建设的关键要素，以评促建，真正构建起中国特色、世界水平的质量保障制度体系，以质量文化促进和推动学校高质量发展。国家、教育部的系列政策导向和具体举措，加强了质量文化建设的广度、深度、力度，其目的在于引导高校对质量的理性回归与价值重构，以文化引领推动质量生成，以文化建设夯实强国之基，以文化创新实现本体超越。因此，以质量文化为支撑的高质量发展是各高校在建设教育强国实践中的应有之义。

其二，重塑教育生态的必然要求。当前的时代语境，已经发生了全面且深刻的变化。特别是在中国式现代化、教育强国建设、高质量发展等战略布局以及教育、科技、人才机制体制一体化、新质生产力、数字化转型、老龄化叠加少子化等深刻变革下，催生了教育场域以高质量为核心的全面变革与深化改革，加速了从“教-学-管”的教育生态重塑。这一过程是多维因素的综合，需要内部与外部、内部各要素、各层级之间有序良性互动，形成符合时代语境、贴合深刻变革、契合教育规律的重塑与重构。质量文化蕴含深刻的价值理性，对高等教育质量保障具有规约和引导作用[7]9-15，其建设好坏对学校办学实际、综合改革、高质量发展起着重要作用，既是推动教育场域与政治场域、社会场域的黏合剂，也是高校重塑教育生态、重构教育体系的新引擎。因此，高校要从文化生态学视角下以质量文化为引领，把立德树人作为根本任务，突显中国特色、世界一流的追求，结合自身办学定位和优势特色，坚持党建引领、

中国知网　https://www.cnki.net

立德树人，坚持目标导向、系统规划，聚焦高质量体系构建和内涵式发展，围绕教育、科技、人才一体推进，深化教育综合改革，以质量提升的系列行动增强质量保障能力和持续改进效能，推动高校构建符合时代语境、具有中国特色和中国文化作为基底的内部治理体系和治理结构。

其三，化解质量危机的关键抓手。高等教育并非只是教育概念的一个子集，而是一种自由的、解放的教育观，其本质在于学生个体的心智发展。[8]3-12高等教育质量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人才培养质量的高低，人才培养目标的达成度既是衡量高校办学质量好坏的关键标准，也是各类教育教学评估的重要指标，更是“以学生为中心”教育理念落实和推进的成效体现。当前，受社会发展转型范式的影响，常规专业知识的学习已然不能满足学生的成长发展与社会的实际诉求，高等教育普及化及就业难等现实问题推动高校亟需保持主动适应社会的觉醒，回归教育的本质，秉持以学生为中心、以生为本的教育理念来审思人才培养规格与路径。因此，高校在办学过程中，应从技术层面和理性层面形成人才培养共识，把质量文化作为对学生增值评价和丰富体验的重要手段，在人才培养过程中超越教与学本身的活动，关注学生的多样发展和多元需求，回应社会的热点关注和理性批判，防范、化解引发质量危机的风险隐患，增强人才培养的达成度和竞争力。

二、高校质量文化的建设逻辑

质量是量度物体平动惯性大小的物理量，美国管理大师德鲁克认为“质量就是满足需要”；文化是生活在共同环境中，由共同的行为习惯、共同的理想和共同的生活方式联系在一起的人类群体创造的思想、制度、行为、物质等，具有“创造性”“涵育性”“延续性”等特征。[9]17准确把握质量文化的内在属性，既要从历史维度把握发展脉络，又要从现实维度把握时代特征，运用多重定义、多维属性对高校质量文化的社会视阈、哲学属性、教育立场、实践场域进行深入探析和系统认识。

其一，社会视阈是建设质量文化的出发点。教育是时代的教育，是一定社会的教育，社会需求对教育产生或深或浅、或全面或局部的影响。学校作为社会运行制度结构化的一部分，反映了人们共同教育需求的社会建构和行为模式，要在社会分层、互动仪式、发展变化中不断依据新需求作出调整[10]，以高质量的教育回应社会关切与社会问责。在复杂的社会系统中，只有以坚定的质量文化作为引领，才能在社会各环节的运动与各要素的互动中减少冲突、促进变革，推动教育强国建设向前发展。因此，质量文化的社会属性概念主要体现于某一时期的某一特殊社会生活方式、价值观的整体称谓[11]以及人类追求质量的社会实践的总和。在教育强国建设进程中，质量文化理应引领教育创新改革，推动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发展，增强服务地方经济社会发展能力。此外，质量文化还应蕴含具有一脉相承文化基因的教育家精神，推动对教师作为第一资源、第一保障、第一支撑的共同价值认同，增强主流意识形态的

中国知网　https://www.cnki.net

感召力、凝聚力，为教育强国建设提供精神指引和价值支撑。

其二，哲学属性是建设质量文化的支撑点。人是理性的、道德的和精神的存在，人是具有“完整精神”的“完人”，“教育的文化功能”要与“灵魂的铸造功能”融合在一起，专门的教育要与“普遍的精神”或“普遍的文化”结合起来，促进人的理智成就的发展。[12]理性是文化的基本特性，也是高等教育的基本特性。[8]3-12质量文化的哲学属性强调理性、重视理智，在此基础上体现出具有共同信仰或行动前提的奠基性，从事理性追求、保持自身完善的启蒙性，超越思想与行动、催生新实践的解放性。在教育强国建设进程中，质量文化可以促进大学进一步履行好现代大学的社会责任，发挥好国家和社会公众主要服务者和社会变革主要工具的重要作用，以价值判断提高高深知识的精准性，强化高等教育的政治化、学术知识的现实化，缓解与周围社会秩序之间的关系，进而更好解决高等教育“本体性危机”“合法性危机”。

其三，教育立场是建设质量文化的关键点。质量文化的教育属性概念是基于教育学的内立场和母学科，对质量文化深层次价值抉择与本身实际活动的建设样态的集合方式，其目的是回归本质，尽可能避免因社会现实功利需求影响教育的内在规定性与内功能，核心指向是人才培养质量。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教育强国建设进程中，质量文化要体现党对教育事业的全面领导和“为党育人、为国育才”的初心使命，以立德树人为根本任务，树立以生为本的质量观，强调从知识到理解的高质量教学。其结构性界定包括在人才培养全过程中反映水平和效果的动态性指标，外显性表征为质量标准、质量监测、质量评估、质量控制，内隐性表征为质量意识、质量价值、质量责任、质量认同，其逻辑就是以质量为核心的组织文化的构建。

其四，实践场域是建设质量文化的立足点。教育发展与教育政策不是从哲学流派演绎出来，而是从实践中的矛盾与未定论问题出发[13]，援引相关哲学观点，以现实主义和实用主义实现价值自由。因此，质量文化的实践属性蕴含着支配群体行为在追求高质量过程中的一系列价值观念、信仰和信条。它既从长期实践中产生，也终将在实践中不断发展，强调思维与行动之间的连续性[14]172以及信念与工作、权力等结构的紧密性。[9][10]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教育强国建设实践中，质量文化需要体现主导价值观，成为教育现代化进程中社会导向与学术导向、现代化与传统化、依附性与独立性的调和剂，缓解目标的模糊性和相互冲突，聚合利益相关者的共识，引领政策理性制定与教育深化改革，推动教育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以上从四个维度对质量文化进行功能性、价值性、结构性、划界式等多重界定和解读，以期把握质量文化建设的本质内涵。教育强国建设背景下的质量文化建设要立足于社会视阈、哲学属性、教育立场、实践场域之上，体现以下内在逻辑：一是由工具技术的异化、程序化转向价值理性和工具理性的统一，内生文化自觉，以质量文化的理念建构增强思想引领力。二是坚持以学生为中心的根本立场，回归教育本质与规律，推动人的自由与发展，以质量文化的意义增强人才竞争力。三是把质量文化作为内核，形成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化发展的共识，促进共享合作与协同创新，开展

中国知网　https://www.cnki.net

“有组织科研”与“负责任科研”，以质量文化的动力供给增强科技支撑力。四是在国家现代化和教育普及化中，追求教育公平的最大化与教育质量的最优化，以质量文化的价值所指增强民生保障力。五是履行好大学的社会责任，回应社会需求，缓解冲突、增进合作，形成高质量发展的合力，以质量文化的调和赋能社会协同力。六是坚持自立自信自强，推动质量文化由国际化、统一化的外生移植转为本土化特色化的内在自觉，促进质量意识和道德自律融合、质量责任与质量实践融合，以质量文化的守正创新增强国际影响力。

三、高校质量文化建设的现实困境

回归质量本身、唤醒内在自觉的质量文化建设是推动高质量发展的突破口。在质量文化具体实践中，欧洲多数高校主要是在组织结构、文化心理、领导和参与沟通四个层面进行尝试并发现其存在问题。[7]9-15由于我国高校办学历史不长、办学之初基础较弱导致的文化积累不足[15]，当前质量文化建设主要存在着顶层性、内生性、系统性、落地性不足，以及参与度、运行度、有效度、彰显度不够等问题。

其一，“目标无序”制约质量文化的内生引领。大学能够拥有源源不断的生命力向前发展，在于“它们内在一致性的、使命驱动的价值观已经被其参与者所内化，被其运行的文化确证为重要的”[14]172。质量管理被引入高等教育内部，带来的改变既体现在经济、社会等外在价值上，也体现在学术自治、自由等内部价值上，并导致大学管理文化在一定程度上受到影响。比如，大学商业化、工具化等价值危机，“五唯”不合理教育评价、追崇量化评价等学术危机，治理能力、绩效管理等管理危机，主要原因就在于多重目标下的认识偏差、使命偏离、逻辑偏向而引发的主导目标失重、质量危机和负面叠加效应，内在本质则是缺乏文化引领下的理性选择。以质量文化为核心的发展理念具有外在强加性的特点[16]，追求卓越、建设一流的质量文化目标模糊，在协调高等教育面临的学与术、个人与社会等内外部基本矛盾时导向作用自然就不明显。

其二，“责任规避”制约质量文化的内聚共生。关于高等教育质量管理的主体，学界一般有“双主体”说、“三主体”说和“四主体”说等，其选择依据一般取决于当时发展阶段和时空环境，“双主体”说更适合于精英高等教育阶段，“三主体”说适用于大众高等教育阶段。[17]当前普及教育阶段则倾向于“四主体”甚至“多元主体”，即由外部层面的政府、社会等，以及内部层面的学校、质量部门、二级学院、教师、学生等利益相关者构成。然而在现实情境中，主体成分的缺失影响了质量文化建设的完备性，各主体的角色定位及其拥有的质量所有权不清晰，质量责任履行不充分，行动选择的自由裁量[18]及博弈空间过大，形成质量文化建设共识的聚力性、内生性不够，主动思考和主动参与质量文化建设的行为还未被固化，指向认同与超越的质量文化表征还未显现。

中国知网　https://www.cnki.net

其三,“制度缺失”制约质量文化的系统耦合。文化是组织的意识形态,或“与其他组织相区别并将某种生活浸润到组织结构框架内的组织传统与信念。”[19]158这种意识形态的浸润就是文化的深层次建构。当前质量文化建设过程中,文化观的规范性、制度性并未被具象化,管理实施上的顶层设计、制度体系和具体规划不完备,各层级制度之间合理松散程度的耦合关系不明确。在学校治理结构中质量文化建设的逻辑不够清晰,以文化底蕴突显中国特色、以质量文化赋能教育强国建设的支撑度不够,并未以质量文化深层次组织建构体现质量文化的理性认同、价值期望、共享取向。在质量文化领域的工作中缺乏具体标准,物质层面、精神层面等采取的文化建设措施缺乏制度性。高校中校院两级质量文化建设的体系不健全,学校层面关于质量文化建设的纲领性文件不够清晰明确,导致学院层面质量文化建设在学校统筹下既难以百花齐放,又难以体现自身特点。

其四,“评价异化”制约质量文化的有效持续。就质量文化建设本身而言,建设方式、建设成效的测量维度与测量模型不够明晰,相关利益者关于质量文化的感知差距参差不齐,评价内容与结果的偏离导致质量文化客观性和持续改进性难以确保。结合《深化新时代教育评价改革总体方案》要求,紧扣学校质量管理的实际和教学运行特点,具有正确评价导向的质量文化还未培育成型,以质量文化推动学校质量改进、深化改革上效果还不明显。对“增值评价”“多元评价”“分类评价”等理念的体现还不够充分,通过质量文化引领评价改革推动解决当前教育领域重难点问题的力度效度不大。

其五,“表征趋同”制约质量文化的特色彰显。在各类教育评估的推动下,政府问责向社会问责以及高校自我问责转变,随着高等教育治理由科层模式向市场模式转型,中国高校质量保障体系也越来越强调高校自我评价和自身质量文化建设。[20]然而在质量保障体系构建中,趋同化同质化的问题仍然存在,具有中国特色、自身特点的质量文化突显不足,理念取向上的价值特征体现不充分,缺乏精神内核及其内涵阐释,质量文化的独特功能未能得到彰显。作为大学文化中起着重要作用的质量文化,与高校本身其他方面的文化如学术文化、校园文化等融合度不够,几种文化协同建设的统筹性还不够好,还未构建良性长效的互动机制,在形成合力推动学校完善治理结构、构建现代大学制度等方面,内生动力和内在向心力不足,对外的独特性和对内的一致性未实现良性融合。

四、高校质量文化建设的推进路向

从质量文化的角度完善高校内部质量保障体系,进而推动教育高质量发展是一项长期且复杂的系统工程。高校质量文化建设,理应回应社会关切,结合区域经济社会发展需求,秉持新的质量观,突显学生中心,注重产出导向,形成质量文化建设组织体系[19]195,建立质量共同体[21]。

中国知网　https://www.cnki.net

第一，打造“使命中心”，树立内生聚力的质量价值观。新时代的大学面临着在全球化和现代化双重叠加压力下如何更好履行人才培养、科学研究、社会服务、文化传承和国际交流与合作等职能职责的时代命题，只有秉持中国立场和文化自觉，才能厘清责任担当。中国特色高等教育的质量文化，蕴含着新时代的文化使命，根植于国家文化软实力的深厚根基，体现主导价值观，以内核稳、内生性强的质量共识打造具有中国特色、本土特点的质量文化范式。在教育强国建设这一时代视角下，高校要把质量文化建设作为坚持正确办学方向的重大抓手、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的重要举措以及推动学校改革发展的内生动力，在遵循教育教学规律的基础上树立质量文化观，引导全体师生追求共同的价值理念和理性认同，以质量意识、文化觉醒推动质量标准、质量管理的要素落实到办学治校各方面和教育教学全环节，增强高校治理过程中核心价值观与组织表征的匹配度、融合度和凝聚力，形成自觉、自省、自律、自查、自纠的质量文化，确保人才培养质量的提升和高质量教育体系的构建。

第二，推动“合作共治”，构建协同发展的质量共同体。从组织边界看，质量文化建设的外部主体为政府、社会等，内部主体为学校、各科层组织及教师、学生。各方主体作用的发挥、多元参与的效度取决于共享取向的强度，要明确各质量主体所拥有的质量责任与质量所有权，厘清不同质量主体的责任协调与责任整合，优化外部主体、内部主体以及内外部主体间良性互动[22]，打造协同发展的战略伙伴关系，构建多元主体共治的落实机制和质量共同体结构。此外，指向认同与超越的质量文化实质上是一种信任文化、反思文化、效能文化，在多元主体合作共治的结构中要注重组织氛围和组织文化的营造[23]，以开放和健康两个视角来审视学校氛围[19]195，通过氛围测量工具界定氛围的开放度，从制度、管理、技术等层面归纳组织的健康度，进而培育良性互动的质量文化，建立质量文化认知框架，树立质量意识，达成合作共治的教育质量目标共识。

第三，重构“组织范式”，形成开放联结的质量矩阵。学校是科层要素与专业要素紧密结合在一起的组织，具有科层系统和松散耦合系统的特征。其结构的复杂性决定了质量文化亟需构建一种解决专业–科层冲突、融合价值–工具理性、引领共生–超越发展的组织范式、联结矩阵。一是以开放系统观推动顶层设计。将文化系统作为组织内部的子系统，联结其与结构系统、个体系统、政治系统的内在逻辑关系，围绕精神层面、物质层面、制度层面、行为层面等，对学校质量文化的特点和状况进行梳理，衡量其强度、深度、广度，厘清组织责任与专业责任，明晰质量文化与学术文化、校园文化等之间的关系，形成质量文化战略规划。二是以理性系统观促使制度形式化。将质量文化视为促进理性决策的技术工具，全面梳理学校规章制度，总结现有规章制度对质量这一关键点的突显度，以质量为核心修订完善现有规章制度。聚焦质量文化的形成和建设过程，围绕“自觉、自省、自律、自查、自纠”的内在要求，及时梳理支撑和保障质量文化建设各环节的规章制度，完善“输入–转化–产出”的质量文化建设范式。

中国知网　https://www.cnki.net

第四，注重“持续改进”，塑造良性循环的质量生态。质量文化在推动教育高质量发展过程中理应是动态的、维新的、处于积极发展状态。高校需要结合学术自治与组织管理的特性，强化学术文化与组织文化的融合，避免出现不同主体、不同活动、不同价值观、不同组织文化而产生中断的“空白文化”。[14]172在建设过程中，注重从物质层面、精神层面、制度层面、行为层面对质量文化建设效果和运行情况进行评估，实施以“P（计划）–D（执行）–C（检查）–A（反馈）”模型为良性循环的质量文化建设监控体系，明确质量文化指数，清晰反映各利益相关者对质量文化建设的感知度和期盼度。注重对数据的多渠道收集、多方式处理、多层面反馈，建立质量会商机制，协同推进相关部门形成合力，促使质量文化建设达到“理念形成共识、制度设定科学、运行能够闭环”的效果。推动形成以改进为导向的评估文化，关注院校自我评估过程及结果的反思、对质量标准规范的遵循及自我改进情况，从而提升学生学习体验和提高教学质量，形成突显学生中心、聚焦教学改革、强调质量控制、确保证据支撑的改进机制，真正实现“以评促改”和“以评促建”。

第五，突显“个性特色”，衍生内省独特的质量品牌。教育部强调推进高校分类评价，其目的在于引导各高校基于发展定位与办学实际的不同，结合自身优势办出特色和水平。在追求高质量发展的过程中，质量文化建设需要从外生向内生转变，唤醒主体意识，深挖所蕴含的特色底蕴，凝练精神内涵，彰显个性文化，避免趋同化与同质化，打造质量文化品牌。坚持理论与实践相统一、守正与创新相结合、现代化与传统相继承，注重外驱型质量文化和内生性质量文化的融合，推动形成中国教育传统的精神与智慧。[24]作为质量管理的基层组织，学校内部二级学院应在学校质量文化建设顶层设计的框架下，结合学科专业特点，结合学生发展实际，深入思考有自身特色的质量文化建设方案，细化具体建设任务，促进质量文化与立德树人相融合，与学术文化、校园文化等文化的其他内容相融合，增强以质量为核心的工作效能。

在教育强国建设的新征程上，质量文化建设作为高校质量改革与高质量发展的重中之重，由于其长期性、复杂性等特点，需要在共性特点探讨的基础上，结合实际总结提炼个性特点，深耕精神内涵，找准具体抓手，形成长效机制，积淀文化特色，以学校可培育、可落地、可提升、可传承的质量文化建设模式推动其内涵发展、特色发展、创新发展、持续发展，形成推动高质量教育体系构建的倍增效应，进而赋能教育强国建设。

参考文献

[1] 刘振天，郭华桥. 从“三个面向”到“九个坚持”：教育强国战略思想的发展与创新[J]. 大学教育科学，2024(01)：4–13.

[2] 邬大光. 高等教育：质量、质量保障与质量文化[J]. 中国高教研究，2022(09).

[3] 李志义，黎青青，宫文飞. 新一轮本科教育教学审核评估中的质量文化[J]. 高教发展与评估，2024(02)：19–30.

中国知网　https://www.cnki.net

[4] 洪 林，汪福俊. 高等教育质量文化：特征与研究展望[J]. 现代教育管理，2021(07)：26–31.
[5] European University Association. Quality culture in european universities：a bottom_up approach. Report on the three rounds of the quality culture project 2002_2006[M]. Brussels：European University Association，2006.
[6] 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 教育部关于印发《普通高等学校本科教育教学审核评估实施方案（2021_2025 年）》的通知[EB/OL].(2021_02_07)[2024_12_25]. http://www. moe. gov. cn/srcsite/AII/s7057/202102/t20210205_512709. html.
[7] 李志义，黎青青. 高等教育质量文化的缘起与发展[J]. 高等工程教育研究，2023(06).
[8] 罗纳德·巴尼特. 高等教育理念[M]. 蓝劲松，译.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
[9] 伯顿·克拉克. 高等教育新论——多学科的研究[M]. 王承绪，徐辉，郑继伟，张维平，张选民，译. 浙江：浙江教育出版社，2001.
[10] 珍妮·H. 巴兰坦，弗洛伊德·M. 哈马克，詹妮·斯图伯. 教育社会学——一种系统分析的方法[M]. 苏尚锋，译. 北京：商务印书馆，2021：1–35.
[11] 韦 森. 文化与制序[M].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12–15.
[12] 潘懋元，王伟廉. 高等教育学[M]. 福州：福建教育出版社，2013：77–86.
[13] 约翰·S·布鲁贝克. 高等教育哲学[M]. 王承绪，郑继伟，张维平，徐辉，张选民，译. 杭州：浙江教育出版社，1998：10_11.
[14] 罗伯特·波恩鲍姆. 高等教育的管理时尚[M]. 毛亚庆，译. 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2008.
[15] 别敦荣，易梦春. 高等教育质量文化及其建设策略[J]. 高等教育研究，2021(03)：7–16.
[16] 吴 凡. 全球高等教育质量保障的多元范式、共同趋势与挑战[J]. 福建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4(04)：146–157.
[17] 韩映雄. 高等教育质量管理：体系与方法[M].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3：25–27.
[18] 周作宇. 谁治理：论大学治理主体[J]. 教育研究，2024(08)：111–124.
[19] 霍伊，马萨尔. 教育管理学：理论·研究·实践[M]. 范国睿，译. 北京：教育科学出版社，2007.
[20] 周光礼，胡翔. 建构高校内部质量保障体系：国际经验与中国路径[J]. 国家教育行政学院学报，2024(07)：3–11.
[21] 刘云生. 评价赋能高校教育高质量发展的基本路径与实施策略[J]. 国家教育行政学院学报，2024(07)：29–38.
[22] 安 卓，杜瑞军，陈 燕，等. 高等教育评估与质量保障：现实挑战及未来走向——中国高等教育学会评估分会 2019 学术年会综述[J]. 高教发展与评估，2020(03)：50–56.
[23] 王 可. 新时代中国大学治理能力提升的文化面向[J]. 高教发展与评估，2024(05)：58–68.
[24] 叶 澜. 回归突破："生命·实践"教育学论纲[M]. 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24：263–296.

（编辑：荣翠红）

中国知网　https://www.cnki.net

ment of education, technology, and talents.

Key words: integrated development of education, science and technology, and talents;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collaborative governance; governance paradigm transformation

The Construction of Quality Culture in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towards Building an Educational Powerhouse

CHEN Zhengquan, LI Lian Page 113

Abstract: The quality culture promotes the rational regression and value reconstruction of university education quality, as well as the consolidation of the indicators and symptoms of the "six capabilities" in building an educational powerhouse.

The inherent social perspective, philosophical attributes, educational stance, and practical field determine that the construction of quality culture is not only necessary to promote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but also an inevitable requirement for reshaping the educational ecosystem, and a key lever for resolving quality crises. However, the construction of quality culture faces various challenges, such as goal confusion, responsibility avoidance, institutional deficiencies, evaluation alienation, and representation convergence, which constrain its endogenous guidance and cohesive coexistence. In the context of building an educational powerhouse, it is necessary to establish models such as "mission center" and "cooperative governance", promote the reconstruction of "organizational paradigms", form an open and connected quality matrix, focus on "continuous improvement" to shape a virtuous cycle of quality ecology, highlight "individual characteristics" to derive introspective and unique quality brands, empower the leading role of higher education, and form a multiplier effect to promote the construction of an educational powerhouse.

Key words: building of an educational powerhouse; quality culture in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characteristic universities; educational ecosystem

Breakthrough and Development of the Comparative Education World System Theory

LI Wenwen, ZHANG Jinpeng Page 122

Abstract: The school of Comparative Education World System has a history of more than 50 years. In the pioneering period, Combs and Meyer was the leader of the World System Theory into the comparative education research. During the development period, Arnove actively introduced World System Analysis Theory into comparative education research, and then many scholars selected different theoretical tools to join in the school, and expanded the team of Comparative Education World System. In the integration period, the school overcame the external challenges from globalization and the differences of the two internal paradigms, and achieved new developments based on in-depth research and exploration. This school of thought has brought about development and vitality to comparative education research in terms of research perspectives, theoretical integration, research objects and value pursuits. However, there are still some deficiencies in theoretical construction, research conclusions and team building, which becomes the direction of continuous improvement of this school in the future.

Key words: comparative education; world system theory; education crisis; globalization of education

中国知网 https://www.cnki.net